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对中国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张积
著



漓江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张积 著

四书五经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五经 / 张积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8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ISBN 978-7-5407-6939-0

I . ①四… II . ①张… III . ① 四书—研究② 五经—研究

IV . ① B222.15② 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162336号

SISHUWUJING 四书五经

张 积 著

责任编辑: 胡子博

装帧设计; 李星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村北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1109)

开本: 660mm × 950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123千字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0557366)

出版说明

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唯有文化的兴旺发达，才有国家民族的振兴强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辉煌璀璨，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弘扬传统，播传新知，砥砺精神，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谨从“秉文化情怀，做文化事业”的社训，特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以传扬民族文化精华，发布专门研究成果，期为读者、研究者阅读参考。作者均为国内外文、史、哲领域建树颇丰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擅长的专题，提供简明扼要的讲析，文字不在其多，书不在其厚，重在见解之通达准确，独有会心，能予读者真知与启迪，领悟精要，涵泳其间。本丛书是一开放性的项目，我们真诚欢迎在这一主题下有更多的佳作加入其中。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2014年2月25日

目 录

- 1 第一章 五经通论
 - 1 第一节 什么是经
 - 5 第二节 六经与五经
 - 8 第三节 孔子与六经
 - 12 第四节 五经的确立与变化
 - 19 第五节 经籍的体裁
 - 22 第六节 五经与中国文化
 - 33 第七节 五经总义类名著举例

- 41 第二章 四书通论
 - 41 第一节 四书的出现
 - 46 第二节 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 50 第三节 《四书章句集注》的政治影响
 - 52 第四节 四书类名著举要

- 57 第三章 《周易》
 - 57 第一节 《易经》的作者与成书时代
 - 60 第二节 《易经》的形式与思想内容
 - 64 第三节 《易传》的编者和著作时代
 - 66 第四节 《易传》的思想内容
 - 67 第五节 《周易》学源流

- 72 第四章 《尚书》
72 第一节 《尚书》的形成
74 第二节 《尚书》的篇目和年代
76 第三节 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81 第四节 宋代以来的《尚书》学
- 86 第五章 《诗经》
86 第一节 《诗经》的形成与时代
89 第二节 《诗经》的编排
91 第三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93 第四节 《诗经》的艺术特色
95 第五节 《诗经》学源流
- 101 第六章 《仪礼》
101 第一节 《仪礼》的成书
103 第二节 《仪礼》的篇目和内容
107 第三节 《仪礼》学源流
- 110 第七章 《礼记》
110 第一节 《礼记》的编者与成书
113 第二节 《礼记》的编次与内容
115 第三节 《礼记》学源流
- 118 第八章 《春秋》与三传
118 第一节 《春秋》的含义
121 第二节 《春秋》的作者

- 123 第三节 《春秋》的影响
126 第四节 《春秋》三传的作者与传授
130 第五节 《春秋》三传的特点
133 第六节 《春秋》学与三传学源流
- 140 第九章 《大学》与《中庸》
140 第一节 《大学》、《中庸》的名义
142 第二节 《大学》、《中庸》的作者
144 第三节 《大学》、《中庸》的文本
147 第四节 《大学》、《中庸》的思想内容
- 150 第十章 《论语》
150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
152 第二节 《论语》的名义与作者
155 第三节 《论语》的内容与孔子的思想
157 第四节 《论语》学源流
- 161 第十一章 《孟子》
161 第一节 孟子的生平
163 第二节 《孟子》的篇目与作者
165 第三节 《孟子》的思想
167 第四节 《孟子》学源流
- 170 后记

第一章 五经通论

第一节 什么是经

什么是经？这大概是学习、研究中国经书和经学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问题。然而，自古以来，关于“经”字的解释众说纷纭，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所以，要想彻底明了这个问题，恐怕很不容易。当然，将“经”字意义的演变过程介绍给读者，让大家了解它何以成为儒家经典的专名，从而进一步明确经学的内容和实质，还是大有好处的。

“经”字由“𠂔”演变而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系部》说：“经，织也。从糸，𠂔声。”清代的段玉裁根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六的引述，在“织”字下增补了“从丝”二字，并注释说：“古谓衡直为衡从，……织之从丝谓之经。”“衡从”，就是“横纵”；“从丝”，就是纺织品的纵线。可见，“经”字的本义并不深奥，不过是纺织品的纵线罢了。以后，随着语言的发展，“经”字逐渐产生了引申义，并和书籍发生了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怎样出现的呢？章太炎曾提出一个说法。他说：“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

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①虽然古代并非皆用“青丝绳贯竹简”，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以丝绳、麻绳来编连竹、木简，就是织品与书籍最重要的结合点。

“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注》注释此句说：“经，兵书也。”晚清的俞樾不同意这个解释，指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经，当读为茎，谓剑茎也。”^②“剑茎”，就是剑把子。俞樾尽管引经据典，其实这个解释也很勉强，似乎不足以推倒韦注。自然这一争论可以存而不论，但说明战国时期以“经”作为书名或篇名，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事实了。例如《墨子》一书中，就有《经》上、下篇和《经说》上、下篇。《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和《外储说》篇中也有“经”。若据《墨子》来看，《经》这个部分只是一个论纲，《经说》部分则是对这个论纲的解释或用故事所作的证明和说明。很明显，后来《韩非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分为“经”与“说”两部分，其体例或许来自《墨子》。所以，杨伯峻先生据此推断“经”这个名称“大概起于‘墨经’，而不起于孔子”^③，是很有道理的。

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要的著作称为“经”，最早始于庄子。《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照此来看，“六经”这个

^①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② 徐元语：《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9页。

^③ 见杨伯峻为《经书浅谈》一书所作的“导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名称似乎出于孔子之口。但是,《庄子·天运》篇属于《庄子》“外篇”,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是战国时期庄子后学的假托之作,而不是庄子的作品,不尽可信。不过,“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代称,“应在战国以后”^①,则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当然,在战国以后尽管有人将儒家著作称为“经”,但“经”尚未成为儒家著作的专名。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前,其他学派或其他个人的著作仍可以自由地冠以“经”名。例如,道家经典《老子》,又称为《道德经》;医家的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天文历算方面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贾谊《新书》中有《容经》。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献中,有《十大经》、《脉经》、《相马经》等。

“经”字地位上升并被神圣化,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内外形势的需要,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这样,以孔子为代表而由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著作也就正式成了封建政权法定的经典。正因为如此,东汉的班固把地位急遽上升的“经”,解释为“常”。^②“常”,意味着封建统治的常道是天经地义、不可改易的。应该说,这个解释还是反映了封建经学的一部分实质。

汉代以降,随着经学的不断发展,居于群书首部的所谓“经”,被封建统治政权日益神秘化,甚至宗教化。这主要呈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经”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确认的地位最高的经典。

^① 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1页。

^② 见班固《白虎通德论·五经》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陈立《白虎通疏证》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

不论是《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还是《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①“经”在公私书目中都居于群书之首，给予最大的尊重。由于各个封建政权的推动和表彰，“经”的范围逐步扩大，数量不断增加，从汉代的“五经”、“七经”一直增益到唐宋的“九经”、“十三经”。^②

第二，“经”由相传是孔子所作的“六经”及其经典解释构成。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儒家著作都可以称为“经”。最终厕身于“经”的行列的书籍，是封建政权在从汉至宋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合法的儒家典籍中挑选出来的。

第三，“经”为中国封建统治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也为塑造封建臣民的道德和精神，准备了丰富而合用的思想材料。

上述三个特点，以第三点最为重要。千百年来，统治者关心“经”，表彰“经”，其目的就在这里。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经”下了这样的定义：“经

① 按：《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它系改造刘歆所编的《七略》而成。《七略》的部类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因为“辑略”属于总序，而非具体的图书部类，故计其分类实是六类。《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的分类，亦为“六分法”。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确立以经、史、子、集标列部类的“四分法”。

② “七经”之名，始见于《后汉书·赵典传》。究竟指哪些经书，后人有三种意见：1. 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2. 指《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3. 指《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易》、《春秋》。“九经”之名，始见于《旧唐书·儒学传》。晚清的皮锡瑞认为是指《尚书》、《诗经》、《周易》、《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十三经”之名始出现于宋代。即在“九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书。

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①相比于历史上对“经”的种种定义来说，这个定义可以说直探封建的“经”的本质。

第二节 六经与五经

上节说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著作，正式被称为“经”，并且被确切地指为“六经”，始于《庄子·天运》篇。照该篇所说的次序，“六经”分别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又据《庄子·天下》篇叙述，“六经”的性质是：“《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就是说，《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事实，《礼》讲周旋应对、进退揖让，《乐》讲声音和谐，《易》讲阴阳变化，《春秋》讲君臣上下之道。可见，“六经”包含了原始儒家基本的思想内容。后人讲“孔子之道，具于六经”^②，也正是以此来立论的。

从司马迁开始，“六经”又被称为“六艺”。《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西汉末年刘歆在编著《七略》时，专设“六艺略”以著录儒家著作，从而将

^①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页。

^②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九流诸子”区别于外。班固修《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个做法。那么，为什么把“六经”称为“六艺”呢？近人吕思勉先生提出了一种比较符合情状的解释。他说：“《诗》、《书》、《礼》、《乐》，本大学设教之旧科。邃古大学与明堂同物，《易》与《春秋》虽非大学之所以教，其原亦出于明堂。儒家出于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学亦属矣。”^①这些话旨在说明“六艺”原来都是大学设立的学习科目。既然是学习科目，那么如果从学者学习、掌握知识这个方面来说，则可“谓之六艺”；如果从这些科目的教本这个方面来说，则可“谓之六经”。^②吕先生的这个说法虽有测度的成分，但揆之情理，大体上能够说通。

“六经”的排列次序，是经学史上争论较大的问题。其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排列。《庄子》的《天运》篇、《天下》篇，《商君书·农战》篇（按：缺《易》），《荀子·效儒》篇（按：缺《易》），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淮南子·泰族训》，司马迁的《史记·儒林传·序》，《礼记·经解》篇，属于此派。另一派按《易》、《诗》、《书》、《礼》、《乐》、《春秋》的次序排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白虎通义》（按：缺《春秋》），许慎的《说文解字·序》，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皆属于此派。

排列次序不同，说明两派所奉行的标准不同，对“六经”的成书时间、思想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据近人周予同先生分析，前一派按“六经”的内容程度的深浅排列，近似于学校的由易到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② 同上。

难的课程排列。《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列在先；《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政治学的思想所在，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所以排列在后。^① 后一派则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列。据说《易经》的八卦由伏羲氏所画，时代最早，所以《易》列第一。《书经》有《尧典》，比伏羲氏晚，所以《书》列第二。《诗经》中最早的篇章是《商颂》，比尧、舜又晚，所以《诗》列第三。《礼》、《乐》相传周公所作，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鲁史，经过孔子删订，所以列在第六。

汉代以来，文献上屡见“六经”、“六艺”的名称。但“六经”（或“六艺”）实存《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缺《乐经》。《乐经》何在？后人有过各种推测，主要意见有两种：

1. 《乐经》亡佚说。唐人徐坚等著的《初学记》说：“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

2. 《乐》本无经说。清人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说：“《乐》本无经也。……夫声之铿锵鼓舞，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传，则如制氏等琴调、曲谱而已。……《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欲知《乐》之大原，观“三百篇”而可；欲知《乐》之大用，观“十七篇”而可，而非别有《乐经》也。……周秦间六经、六艺之云，特自四术（按：此指《诗》、《书》、《礼》、《乐》）加《易》、《春秋》耳。”

这两种说法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不过，无论如何，汉代人

^①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所见到和传习的，以及汉武帝时立于学官的都是“五经”^①，即：

《诗》——周初到春秋时代的乐歌。

《书》——商周时期政治文献的汇编。

《礼》——即《仪礼》，先秦贵族实际生活的记录。

《易》——卜官的占卜书。

《春秋》——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第三节 孔子与六经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最早将孔子与“六经”联系起来是《庄子·天下》篇，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引述的孔子对老聃所说的话，自然属于假托之言。它用一个“治”字说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治”，意思是攻读、研习，与撰著相去甚远。然而，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孔子删订“六经”的说法。说的最为系统、明确的当首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

^① 按：体现着东汉官方态度的《白虎通义》，也只认可“五经”。该书的“五经”条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陈立《白虎通疏证》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际，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编，……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尚书》是孔子序次的，《礼》、《乐》是孔子订正的，《诗经》是孔子删削的，《春秋》是孔子撰作的，《易传》的《彖》、《系辞》、《象》、《说卦》、《文言》诸篇都是孔子写定的。

汉武帝以后，随着孔子地位的迅速上升，孔子删订“六经”的说法得到广泛传播，几乎成为定论。到了宋代，疑古之风兴起，一些学者才开始就几个具体问题质疑其说。例如，欧阳修在《易或问》和《易童子问》中明确提出：《易传》（所谓“十翼”）是后世研究《周易》的人们的集体创作，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手。^②宋以后，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极端的意见当数下列两派：

1. 坚持旧说派，认为“六经”（或“五经”）为孔子所撰作。这

^① 《史记·儒林列传》也提到孔子的著经活动，文字颇简要，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旨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② 参见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81页。

一派以清末的皮锡瑞为代表。他在《经学通论》与《经学历史》两部书中，一再申说这一观点。他说：“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式。……《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义、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如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①皮锡瑞从今文经学维护孔圣地位的立场出发，完全不顾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采用不同措辞所显示出来的差别，也完全无视宋儒的有力质疑，一口咬定“五经”皆为孔子所作。

2. 否定旧说派，认为“六经”与孔子无涉。这一派持之最力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钱玄同先生。他认为，孔子根本没有做过删订或制作“六经”的事情。《乐经》无书，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本来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而所谓“六经”的说法出现于战国之末。《诗》是最古的诗歌总集；《书》是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汇编，属于历史；《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易》的原始卦爻是生殖崇拜时代的符号，被孔子以后的儒者借用以发挥其哲理；《春秋》不过是一部“断烂朝报”或“流水账簿”。^② 钱氏继承了宋儒与清儒的疑古精神，吸收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合理看法，显示了“五四”斗士破除封建迷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0页。

^② 详见周予同《群经概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